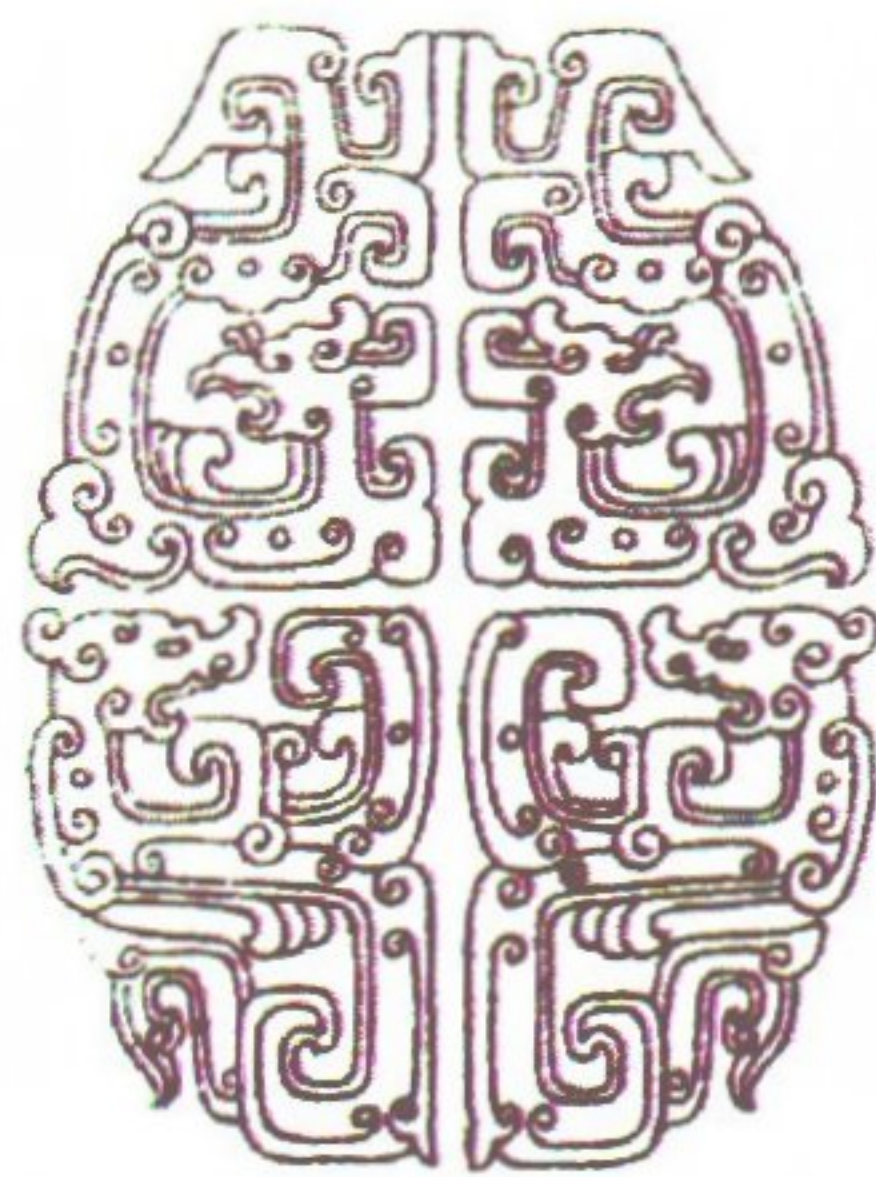


历史起跑线上的反思

——中西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型比较

胡幸福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历史起跑线上的反思

——中西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型比较

胡幸福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用比较方法,探索中西文明转型	(1)
一	比较,历史学的使命与执着	(2)
二	比较,读懂中西古代文明的渊源	(5)
三	比较,探索中西文明转型的机制	(13)
第二章	农业发展的凝滞与骤变	(20)
一	两极制和多级制占有下封建土地制度的变与 不变	(20)
1	中西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与发展的不同 轨迹	(21)
2	中西封建土地制度在封建末期的变化及 影响	(27)
二	单一农业型与农牧混合型生产结构的长与短 ...	(38)
1	中国单一农业型生产结构的特点与发展	(38)
2	西欧农牧混合型生产结构的特点与发展	(43)
3	中西农业不同生产结构的长短	(46)
三	封建农民生产地位、生活处境差异及对经济 发展的影响	(51)

1 农业主要生产者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	(51)
2 农业主要生产者在生活处境上的显著差异·····	(56)
3 中西封建农民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	(58)
第三章 手工业转型时的加速与减速 ·····	(64)
一 中西封建手工业发展的不同背景与趋势·····	(65)
1 封建前期中西手工业高低迥异的格局·····	(65)
2 封建后期中西手工业并驾齐驱的趋势·····	(69)
二 中西封建手工业不同形式的差异比较·····	(73)
1 中西封建官营手工业不同的地位与影响·····	(73)
2 中西封建农村家庭手工业的不同状况·····	(85)
3 中西封建城市手工业不同的关系与作用·····	(92)
三 转型时期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凋谢·····	(100)
1 商品经济将中西封建手工业引向嬗变·····	(100)
2 资本主义关系在中西封建手工业中的萌芽·····	(107)
3 工场手工业在中国和西方的不同结局·····	(116)
第四章 商业发展的等量不等质 ·····	(126)
一 历史转折平台上中西封建商业起点回眸·····	(127)
1 起点高台阶的中国封建商业·····	(127)
2 低层次发轫的西欧封建商业·····	(134)
二 同一平台上中西封建商业发展的背离趋势·····	(139)
1 中国封建商业演绎着“九斤老太的哲学”·····	(139)
2 西欧封建商业演变一场“商业革命”·····	(149)
三 不同性质的商业产生不同的历史影响·····	(156)
1 转型时期跳不出自然经济窠臼的中国商业·····	(156)

2 转型时期造就了商品经济神力的西欧商业	(163)
第五章 科学技术的晚霞与黎明	(167)
一 一路领先的中国传统科学	(167)
1 有过辉煌历史的中国传统科学	(167)
2 东方古代科技的晚霞启明了西方近代科学的晨曦	(173)
二 后起直追的西方实验科学	(176)
1 实验科学在“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下诞生	(176)
2 曙光照耀着实验科学的前程	(178)
三 历史新起点线上的思考	(182)
1 对中国传统科学曾一路领先的思考	(182)
2 传统科学之晚霞与实验科学之黎明的思考	(184)
3 两种科学的不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193)
第六章 解放思想的巨澜与微波	(198)
一 天崩地裂,时代爆发共同的呐喊	(199)
1 资本主义孕育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潮	(199)
2 相同的反封建任务决定着相同的斗争	(214)
二 复兴与启蒙,思想解放各具特色	(224)
1 斗争纲领及战斗旗帜的不同特色	(224)
2 指导思想及实践目标的不同特色	(227)
3 运动发展时空进展的不同特色	(230)
4 不同特色的深层文化思考	(235)
三 青史留痕,惊涛巨澜与死水微波	(239)
1 文艺复兴在人类史上掀起了惊涛骇浪	(239)

2	启蒙思潮在封闭帝国中激起圈圈微波	(244)
第七章	商品经济,解开古代向近代转型之谜的钥匙 ..	(254)
一	中西封建初期商品经济地位的比较	(255)
1	西欧封建初期无商品经济,一切从头来	(255)
2	中国继承了古代商品经济,也继承了桎梏·····	(256)
3	对中西商品经济不同地位的作用与发展的思考	(257)
二	中西封建商品经济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比较	(259)
1	西欧城市和市民相对独立,能专心发展商品经济	(259)
2	中国城市和市民处于依附地位,商品经济受到压抑	(261)
三	商品经济对中西封建制度破坏作用的比较	(263)
1	对封建自然经济的破坏作用不一样	(263)
2	对封建贵族的政治 经济地位打击不一样	(265)
3	在改变整个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念方面的作用不一样	(267)
4	在造就资产阶级方面所起作用不一样	(269)
后 记		(272)

第一章

用比较方法，探求中西文明的发展与转型

历史上中华民族曾创建独领风骚的东方的封建文明。2000年的漫漫长河，它泽及八方，风化四夷，对人类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也给“中世纪黑暗时代”的西欧开启了黎明。然而这种文明是建立在封建土地两极所有制的基础上的，其政治表现则为统一国家和专制政体，其思想核心则是以儒家思想为底蕴的凝固型的整体主义和小农经济观念。这种状况直到16世纪，乃至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都未曾发生过大的变化。

而在世界的另一方，则是以日耳曼人征服，进而由罗马因素与日耳曼因素结合而建立起来的西欧封建文明，这个文明是建立在封建土地占有多级结构的基础上的。它的原始民主、自由的残余长期存在，构成了由封建贵族政治、等级君主制到专制君主制的政治发展脉络。贯穿西欧封建文明的思想文化核心则是基督宗教观念与古希腊科学思想的矛盾结合体。

16世纪—18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在这里开始面临挑战。无论是有过辉煌过去的东方文明，还是后起直追的西方文明，它们在这历

史转折的新起跑线上都拥有过历史的机遇。在公正的时间裁判面前，谁抓住了机遇，占据了优势，谁就是下个赛程的优胜者。

历史不能重复，历史也不能假设。但历史可以借鉴，可以为后人明智。揭示已过去了的那段中西文明的输赢天机，方法很多，但最简单明了、也最具深层意义的还是将两个文明放到历史的天平上进行一下比较。

一 比较，历史学的使命与执着

古往今来，对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是很多史学家采用的一种方法。20世纪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各国各民族间的交往空前活跃，殖民体系的崩溃，多数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国际关系空前复杂。新的世界格局促使史学家跳出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局限，对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跨越国界、跨越时代的广泛的比较研究。于是历史的比较研究由一种研究方法发展为历史学的一个新学科——比较史学。

1928年，法国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建立欧洲的比较史学》论文的发表和稍后他的名著《封建社会》的问世，给比较史学的形成以最有力的推动。1958年，在美国创办的《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杂志，是西方比较史学的国际论坛。今天，比较史学已成为一种“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

在中国，比较史学聚焦于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着中国比较史学的这一特点。中国是人类文明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近代以前，不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都居于世界的前列。但是，从16世纪开始，西欧文明的发展水平逐渐赶上和超过了中国，从根本上动摇了

中华文明的先进地位。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把中华文明生死存亡的问题无情地提到了每个炎黄子孙的面前。于是，了解中西文明发生先进与落后位移的原因，寻找重振中华文明的道路成了很迫切的问题。为着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中西两种异质文明的比较。

起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得措手不及的中国人，企图从西方学些什么东西以改造中国。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从利用西方宗教来反封建，到一概反对和排斥西方文明；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国等方案都认真地实践了，而且有千百万中国人为之付出了生命。其收效不可谓不大，每次都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至少使中国人加深了对自身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认识；但也不可估计过高，因为重振中华的出路并未找到。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严酷的现实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从西方文明生长出来并对其持否定立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才是重振中华惟一正确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变革中国社会的同时，史学界也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反思。最初，这种反思是围绕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争论展开的。争论的实质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没有像西欧那样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便不可避免地要对中西文明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人们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见解。概括起来有：“地理环境决定论”、“落后民族入侵论”、“农民战争破坏论”、“没完没了的封建化过程论”、歪曲了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等等。可见，当时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并不深刻。当然，也有翦伯赞、范文澜、邓拓、王亚南等一批著名史学家提出了许多很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见解。但从整体

上说,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还没有系统地进行,也没有取得足以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开放的风气和社会的进步,极大地激发了史学工作者进行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的热情。不论是老一辈史学家还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很多人对这一研究领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1982年以来,先后在昆明、长春、天津、广州、贵阳等地召开的关于历史比较研究学术会议上,中西文明的比较都成了会议的中心议题。一大批论文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也有一些专著问世。多数参与这一领域的研究者,都力图通过比较研究来探索中西封建经济结构解体迟早不同的原因,认清中西封建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也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国为何未能像西欧那样顺利地从封建文明转化为近代文明。中华文明应如何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新的中华文明?很明显,是力图为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现代化提供历史的借鉴。可见,这个研究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社会效益和现实意义。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史学发展的一种可喜的突破,且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但是,在中西文明比较研究深入开展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把中国古代史描绘为一部黑暗的苦难史。“农民战争破坏论”、“落后民族入侵论”、“没完没了的封建化过程论”,绕了一个大圈子以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似乎列祖列宗并未为子孙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要构建新的中华文明,只有“全盘西化”才是出路。这完全是错误的观点。历史雄辩地说明,中华文明是可与西方文明媲美的一种优秀文明。16世纪后我们落后了,这完全事出有因,我们不能因之而全盘否定我国古代的辉煌文明,而应该通过比较研究,

找出症结所在，从而给今天的发展以借鉴。特别要研究转型时期中华文明中的精华，使之发扬光大，完全应当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新的中华文明的出发点。

二 比较，读懂中西古代文明的渊源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和欧洲封建社会几乎同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孕育在封建关系中，封建生产关系越发展，它的经济越繁荣，就越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创造条件，这是一般的道理。若照此说，中国应该是最早完成从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西欧在不到 200 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封建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转型，倒是中国却一直停留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是封建经济的补充，科技文化一直处在落后地位。如果不看中国古代历史，不研究转型时期中国特殊的国情，光把眼光盯在近代，拿处于后进地位的中华文明与先进的西方文明比较，难免使人感到有些气短，似乎中国现在不行，古代也不行，对中国古老文明持否定态度。这绝不是历史的态度。为更好地对转型时期中西文明进行比较，我们有必要把眼光延伸到古代，将中华文明置于世界范围内作历史的、客观的考察，就不难发现，中华文明是人类创造的一大优秀文明。

中华文明是起源很早的古老文明。虽然它比北非、西亚、南亚次大陆的古老文明起源要晚一些，但在历史的更替、演变的长河中，多少古老文明之花枯萎了、凋谢了，仅留下那些供后人瞻仰、凭吊和探索的历史遗迹。惟独古老的中华文明有如长江之水，源远流长，奔腾不息，绵延至今，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文明的辐射效应使东亚地区蒙古利亚人的各部落都受其作用和影响，形成了对中原文化的向心力。这与得天独厚的地理因素不无关系。相对来说，人类文明起源最早的环地中海广大地区，由于各原始部落受到多种文明的作用，不可能形成东亚地区这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东亚地区的各原始部落在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交互作用下，实现了大范围的民族融合。中国早在秦始皇统一后，就已基本形成了“书同文，车同轨”的民族综合体，促进了现代民族诸要素的较早形成。而西欧各民族国家则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条件下才形成的。相形之下，中国这种巩固的综合体，有利于发挥民族的整体力量，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

民族的整体性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世界上曾经形成过不少大帝国，这些帝国都因没有自身的经济基础，缺少必要的民族凝聚力，而只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很快瓦解。只有中华民族，不管历史风云如何变化，几千年基本保持了大一统帝国的局面。尽管自然经济的分散性，决定着中华大地也多次出现分裂割据的情况，但由于它拥有很强凝聚力的民族文化，因而“分久必合”。合是长久的，占主导地位的；分是暂时的，居从属地位的。这种情况在世界其它各国是罕见的。

民族的整体性是国家能有效地防御游牧人入侵、保卫中华民族连续性的可靠保证。中华民族是一种农耕文明，同世界其它农耕文明一样，经常遭受游牧人的袭击和征服；而且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所受磨难之深是世界历史所不多见的。不少发达的农耕文明常由于这种袭击和征服而毁灭。可中华文明不但未遭毁灭，而且顽强地生存下来，不断向前发展。中华文明凭借着整体力量力争与游牧人和平共处。中国人主张“和为

贵”。为了求得和平，甚至不惜将公主、淑女远嫁。通过和亲密切了同游牧人的交往，激发了他们对中原文明的向心力，许多游牧人加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来。对不愿和平相处的游牧人，能驱逐者则驱逐之，汉武帝就曾把不愿与中华文明和平相处的匈奴人逐出亚洲；不能驱逐者则发挥民族的整体力量进行抵抗，力争把游牧人拒于国门之外。万里长城这一古代世界仅见的规模巨大的防御工程体系，就是中华民族顽强地抗击游牧人侵袭的坚强意志的见证。游牧人的剽悍和机动作战的能力常使农耕民族无法抗拒，而被游牧人征服和统治，农耕文明因此而遭毁灭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具有民族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却能冷静地应付这种危机。即使国土暂时被征服，但在与征服民族共处杂居，在不同文化的交往融合中，始终保持了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和优势。其结果每次都不是被征服文明的毁灭，而是征服者被融合于被征服民族之中。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使之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民族的整体性也使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成为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优秀文明。西方学者也承认，近代以前全人类的一切重大发明，有半数以上属于中国。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四大发明传到西欧后，曾引起那里政治、军事的深刻变革，给“中世纪黑暗时代”带来了黎明。至今这些发明仍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中国人还率先开辟了东西方交往的大动脉——丝绸之路，改变了人类交往仅限于毗邻地区的格局，促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通过丝绸之路将现代化高科技生产的织物也无法与之媲美的丝绸及其生产技术的西传，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衣着条件。至今人类仍然享受着这一中华文明的馈赠。都江堰、灵渠、大运河等巨型工程，既标志着当时中华文明的发展高度，又起到了造福子孙万代的作用。在古

代史上，还没有另外一个民族向人类提供了中华民族这样多的、又造福于后代的创造、发明和发现。中国还拥有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成为人类取之不尽的智力宝库。单就历史记载而言，世界上没有其他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有中国这样完整的记载。历史是一个民族对自己过去的记忆。一个有完整的记忆、历史感很强的民族才能创造辉煌。

中华文明还建立了维护其整体性的封建经济结构。突出表现为历史上先进的封建土地两极所有制，即封建土地所有权被分割为国有与私有两大部分。国家除直接占有部分土地外，对全国土地还拥有最高所有权。这部分国家所有权不能随意买卖和转让，是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的物质基础；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整体性不可缺少的经济条件。土地私有权部分是可以买卖和转让的，而且封建政治权力相对游离于土地所有权，大地主便难以形成各霸一方的割据势力，这也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的民族整体性的实现。土地私有权的买卖和转让，造成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不仅地主与农民的地位可以相互转化，而且农民在自耕农、佃农、流民三个阶层中也可相互转化。这种运行机制，一方面使农民对地主的世袭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可能形成，另一方面又由于国家对全国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农民和地主对国家都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于是，形成一个鲜明的特征：农民虽是国家的农奴，但不是地主的农奴，对地主而言，他们是自由的个体小农。个体小农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要靠皇帝来代表他们、保护他们的利益。皇权便起了马克思所说的，把单个马铃薯装成一个整体的布袋的作用。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这具有特色的小农经济反而成了国家统一和民族整体性的基础。

土地买卖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虽

然“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但当时占有土地的多少是衡量拥有社会财富多少、社会地位高低的尺度。因此，在很多人“舍本逐末”的同时，也有很多人“弃末归农”。“逐末”只是手段，“归农”才是目的。故人们的经营原则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这种运作机制虽然能保持工商业有相当的发展水平，但却造成了工商业依赖于农业、工商业资本转化为封建地产、工商业者投靠于封建统治阶级、商业经济受制于自然经济的局面。商业经济虽表现得很有活力，但始终未能挣脱自然经济的羁绊。无力突破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格局。这种运作机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封建制度的稳定，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整体性，但却妨碍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条件的生成，也决定了16世纪后中华文明的先进地位必然为封建经济结构较有利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西欧所取代。

土地所有权的不稳定性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性的必然结果是，布衣可以为王侯将相，王侯将相也可以为布衣，甚至农民也可以当皇帝。在这一政治运作现象的背后，便是统治阶级中的腐朽者不断被清除出局的同时，被统治阶级中有才能的人被吸收加入到统治阶级中来。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能吸收新鲜血液，因而是强有力的。从这方面说，它使封建统治政权和集权体制不断完善，这也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整体性。但另一方面，它又使烂熟的封建制度一再延挨寿终正寝的时间，老态龙钟的封建帝国难免成为历史的落伍者。

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形成了民族综合体，封建经济结构也有利于民族综合体的巩固和发展。在求生存、求发展的长期奋斗中，民族的整体性，使中华民族形成了整体主义的民族精神。

然而，这是一把双刃剑。在落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华民族发挥了民族的整体力量，才创造了当时最具辉煌的中华文明，它对全人类作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但先进地位和整体主义消极面的历史沉积物又使中华文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抑制了民族的创造才能，成了整个民族再造辉煌的负担，在社会转型期中华文明由先进转化为落后。只要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再创民族的辉煌。

16世纪后，西欧文明逐渐取得了世界先进地位，成了人类的又一大优秀文明。

西欧文明的优秀并不在于古典希腊文明的辉煌。尽管希腊人创造了非常卓越的奴隶制文明，但由于未形成民族的整体精神，这一文明在历史的洪流中泯灭了。西欧文明的优秀也不在于罗马帝国的雄姿。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世界帝国“它并不表现任何民族性，它只是民族性缺乏的表现”。最终也只能成为“在垂死文明中挣扎的世界”。日耳曼蛮族的征服才使这种垂死的文明“返老还童”。但日耳曼的原始性，使西欧各国长期处在小国林立、文化落后、经济衰败的“中世纪黑暗时代”。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未能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谈不上对人类作出过任何重大贡献。

日耳曼人之所以能使西欧文明年轻起来，是因为他们为西欧带来了氏族社会所固有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个人进取精神。这些原始社会的精神，在中世纪时期得以保留、改造和发展，而焕发出改造世界的巨大活力，最终使西欧文明取得了世界先进地位，成了世界又一大优秀文明。

日耳曼人的原始性，使西欧的封建土地制度只可能通过层层亲族分封而形成的土地占有的多级结构。多级结构的特点是在土地所有权多层次分封的同时，将土地上的政治权力一起

分封。封建特权与土地所有权紧密结合，大贵族都有拥兵割据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能形成。政治权力与土地所有权的直接结合使土地所有权的买卖和转让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土地所有权是稳定的。土地所有权的稳定性，决定着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也是稳定的。贵族世袭为贵族，农奴世袭为农奴，统治阶级成了一个排他性的闭塞集团，不可能在不断的更新中保持自身的强大。土地和农奴地位的世袭，又使西欧能建立独特的封建庄园。庄园既是国家的基层政权组织，又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同时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细胞，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整个社会由一个个庄园组成，因而也难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由于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制约，贵族便乘机加强自己的特权，发展自己的个性。封建社会初期，西欧各国普遍存在称为“贵族民主制”的政治制度。大贵族不仅参与选举国王，而且认为国王只是“平等者中的第一员”。例如在德国，贵族民主制一直存在于整个中世纪时期，大贵族选举皇帝的制度还用“黄金诏书”的法律形式固定为“七选侯”制度。恩格斯认为贵族民主制使民族国家不可能组成。封建社会发展时期，王权虽有所加强，但贵族的自由意志仍然存在着发展的机会。当时，各国都建立了等级代表机关（三级会议和国会）。例如贵族可以在等级代议机关中同国王讨价还价，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英国贵族还强迫国王签署了“自由大宪章”。自由人的自由和生命财产安全受法律保护，国王不能随意侵犯。封建社会后期，西欧多数国家形成了专制君主制，但那里的君权决不具有像中国君权那样的绝对性。君权不仅受到三级会议和国会的制约，而且国王虽不在任何人之下，但“王在法下”的传统仍然在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